

《诗经·秦风》秦人尚武精神管窥

□ 雍际春

秦人形成崛起于甘肃东部,长期生活于甘陇之间,与戎狄为伍、农牧并举,长期受戎狄风俗习染,还有频繁的战事,加上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广布和林木草深的自然环境,磨砺和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性格与坚毅尚武的精神风貌,这在《诗经·秦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收有《秦风》十篇,分别为《车邻》《驺虞》《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晨风》《无衣》《渭阳》和《权舆》。根据前贤的研究,从《车邻》至《终南》前五篇为一组,产生于西周后期;后五篇从《黄鸟》至《权舆》为一组,产生于春秋时期。前五篇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篇,皆成诗于天水地区;后五篇春秋时期的作品虽成诗于关中,但所反映的内容与风格,则与秦人崛起之地天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按题材划分,则有车马猎战、讽咏君主、表达思念之情三类。其中表现车马猎战,直接与尚武精神相关的就有《车邻》《驺虞》《小戎》和《无衣》4篇。

成诗于天水的五首诗篇中,《车邻》是一首赞美秦仲及车马的诗,秦仲时,秦人始有车马礼乐,该诗赞颂的正是车马之事;此类诗还有讴歌射猎的《驺虞》。《小戎》则是歌颂了秦人开国君主襄公与车马兵器之盛。成诗于关中的五首诗中,《无衣》一篇乃秦人教战之歌,也就是后世的军歌、战歌。可见,车马田狩之事在秦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秦人尚武精神的生动写照。

一、善于养马的生活方式

嬴秦先祖伯益佐禹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故称伯益,并被舜赐姓嬴氏。这调驯的鸟兽中可能就包括马匹。再如非子在西犬丘“好马及畜”颇有所成,故有人“言之周孝王”,被周孝王征召并为其养马于渭滨之间,“马大蕃息”,大获成功,由此而获姓受封。说明秦人获姓称秦,既是其因地制宜发现和选择利用优质牧草养马取得巨大成功的标志,也是秦人善于适应环境、发挥地利优势得到快速发展壮大的反映。《诗经·秦风》中充斥着车马田猎、出行征战的内容和尚武奋进的精神。如《车邻》《驺虞》《小戎》诸篇皆言车马之事,《驺虞》篇:“驺

孔阜,六轡在手。……遊于北园,四马既闲。”《无衣》篇:“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等,反映的正是这种景象。

二、长于车马的行为习尚

从《史记·秦本纪》记载看,有费昌、孟戏、仲衍、造父等嬴秦首领分别曾为商王和周王驾车。如造父为周穆王御,得八骏马,并随穆王西巡,徐偃王作乱,造父驾车一日千里以救乱。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圆顶山墓地等秦早期文化遗址中,多有车马坑发现。2012年夏秋在毛家坪新发掘墓葬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车马坑和战车,并有长矛等兵器。《秦风·小戎》描写的正是秦人长于车马和赞美车马的诗篇。《小戎》为先秦时期的兵车名,《传》云:“小戎,兵车也。”《音义》:“小戎,王云:‘驾两马车者’。”在毛家坪车马坑中出土的两马战车,正是名为“小戎”的战车。我们将考古发掘新材料与《小戎》篇诗句对照就会发现,《小戎》“写车、写马、写兵、写饰,无一不实,无一不确……先秦古车的轭鞅式系架方式,更因《小戎》描写了最为关键的部件,以最简洁的语言,留下了准确的、也是唯一的记录”。

三、英勇善战的民族性格

按记载,秦人先祖和首领中,中湫之子、孙“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可以看做是其首领中以武将身份而成为商朝重臣的代表。进入西周,造父曾在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乱中发挥了重要的辅佐作用。而从中湫至公伯期间,秦人与西戎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友好相处之后,由秦仲始,双方进入了长时间的交战攻伐。自秦仲至武公七位君主中,共与西戎发生大小战争约12次,这些战争,秦人败少胜多,秦人不仅不入主关中,迅速扩展了国土,而且也有力地阻止了西戎的内侵。可见,秦人具有很强的军事力量,而且军力上升很快。

杨宽说:“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国的政治、经济、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且也决定于一国的民气。”秦人的“民气”突出的特点是尚武勇猛和农战结合,特别是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政策后,兵民合一和战场上—往

无前、同仇敌忾、慷慨赴死的战斗激情异常高昂。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样的诗句,便是秦人“民气”高涨的生动体现。陈继揆认为其“开口便有吞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如此豪壮的诗句,在《诗经》中难以找到第二篇。所以,秦人“出其父母怀妊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死于前者比是也。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可见在早期秦人身上,的确洋溢着一种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

四、尚武勇猛的精神气概

在《诗经·秦风》诸篇中,载有龙盾、公(三隅矛)、弓、戈、矛、戟等数种兵器。以兵器入诗,必为其习常所用,信手拈来。在礼县秦墓中出土的兵器有戈、剑、箭镞、匕,其中还有铁质的剑。秦人又是较早掌握了冶炼和铸造铁器的技术,铁剑等兵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兵器的锋利程度,自然战斗力也随之提高。秦人长于养马、善御和善战与其崇尚武力的风尚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前三个特点共同催生了秦人尚武的特征。嬴秦族人懂养马、善驾驭是其传统的特长,其入居天水之后,一方面当地适宜畜牧的条件使其养马特长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秦人又与善于车马骑射的西戎部族长期为伍,在交错杂处特别是旷日持久的对峙交战中,秦人练就了果敢勇猛、粗犷悍厉、轻死重义的民族性格和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秦风》中以歌颂本民族车马田狩和纠纠武夫的内容居多,秦人正是挟这种大无畏和积极向上的文化优势,迅速走向崛起,并形成了以尚武刚毅为特征的军事文化。

我们从《诗经·秦风》可以看到,秦人不仅精通射猎车马技术,而且其兵民合一善于吃苦、长于车马、乐于学习、习于射猎、勇于作战、轻死重利,盛行尚武之风的民族习性和价值追求,始终保持如一,而且愈益强烈,形成了典型的尚武精神。它是支撑秦人一路高歌猛进,一统天下的文化优势所在。

(作者系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潇湘竹石图》



邓拓捐国宝

□ 郑学富

今年适逢邓拓诞辰110周年,中国美术馆推出“斯文传古风——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这批作品上自宋元,下至晚清,其中有传为北宋苏轼所作的《潇湘竹石图》。58年前,邓拓将个人珍藏的140余件(套)古代绘画珍品无偿捐赠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正如展览《前言》所说:“‘清节迈多士,斯文传古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懿德亮节,令人景仰。”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福建闽侯人。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著有《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等。他笃好书画,不仅操笔弄翰,在工作之余还注重研究和收藏积累古代书画。邓拓当年为买传苏轼作《潇湘竹石图》,不惜用上《燕山夜话》的稿费,还变卖自己收藏的14幅古画,将画买了下来(时价5000元)。据邓拓之女邓小虹回忆:“为了研究和考证,父亲从历史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织品的样标,用放大镜细心观察、分析历代丝织经纬的特点……”足见他钟情至深。

当年邓拓买画,还被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说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轩然大波。后北京市委很快查清此事,平息了这场风波。1964年,邓拓请文物专家荣宝斋的许麟庐先生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40余件佳品,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其中还有沈周的《萱草葵花图卷》、唐寅的《湖山一览图》、吕纪的《牡丹锦鸡图》、仇英的《采芝图》等,多属国之瑰宝。

邓拓曾有诗云:“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人民艺术新天地,展望方来万里途。”也正是他无私境界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富有革新精神的清代医学家王清任

□ 祁建

梁启超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概述清代医家的学术成就时,特意指出:“唯有一人不可不特笔重记者,曰王助臣……所著书曰《医林改错》……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获得梁启超高度评价的王助臣,即王清任,是清代一位颇具创新精神的医学家。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是清代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勇于进行人体解剖实践,革新和丰富了我国人体解剖学的内容,大胆创新医学理论,力求把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科学地建立在人体解剖构造上。王清任的革新精神,在当时颇遭攻击,说他是教人在尸骨堆上学医道,诬蔑《医林改错》是“无知妄作”。

1830年,王清任将42年间实地所见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他的临床心得及其它有关的医学论述,著成《医林改错》。该书刻版刊行于世的第二年,王清任逝世于北京友人家中。

王清任自幼喜爱武术,随父练拳习武,勇于改革进取。他先为武庠生,做了“千总”,后改学医。由于他敢于改革创新,医术大进,名扬乡里。

王清任20岁左右就开始学医,读过许多古代医学著作。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长期以来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年轻的王清任,发现古医书中对人体脏腑的记载存在许多讹误,他渴望能亲眼看到人体内脏的实际情况,可是在当时,这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王清任30岁时在北京开“知一堂”药店,救人无数。在医疗实践中发现,自宋元以来,相传脏腑诸图,疑不尽合,皆有错误。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因此,他决心改前人之错,绘出精确的脏腑图。通过多年的艰难实体查证观察,王清任发现古医书中所绘制的内脏图与人体实际内脏有很多地方不相符。他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内脏实际情况绘

制了25幅图,并连同古人画错的图一起收入《医林改错》中,以作比较。通过亲身验证,王清任对人体内脏的认识,确有许多新的见解。从解剖学角度,他纠正了古人所认为的肺有24个行气孔的错误,纠正了古人所认为的气管是直接插入心脏的错误。他大致查明了主要的动脉和静脉的分布,以及它们和心脏的联系部位。王清任还观察到了视神经,并联系视觉做了描述。他的这些观察和认识,比之前人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王清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医林改错》一书体现了坚持实践并从实践中去寻求新的理论的革新精神。

《医林改错》一书3万余言,有图谱25幅,自创新方31个,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载有“古人所绘脏腑图形”和王氏“亲见改正脏腑图形”,并从解剖和生理学角度撰写了“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卫总管气府血府记”“津门津管遮息总提珑管出水道记”以及“脑髓说”“气血合脉说”等。记叙其通过尸体解剖观察所见,纠正了古人对脏腑解剖和生理功能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并阐明其“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和“治病三要诀,在明白气血”的学术观点。

下卷主要是论述王清任运用祖国医学气血学说对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小儿半身不遂、痿痹、瘟毒吐泻转筋、抽风、痘疹、女子不孕、难产、痹证、癫狂、痢证等50余种病症的临床医学理论认识和诊治经验。特别是着重介绍了王清任结合不同病症的病因病机特点而创制的活血化瘀方剂,诸如补阳还五汤、止泻调中汤、保元化滞汤、助阳止痛汤、黄芪桃仁汤、黄芪赤风汤、黄芪防风汤、急救回阳汤、解毒活血汤、通经活血汤、会厌逐瘀汤、身痛逐瘀汤、癫狂梦醒汤、少腹逐瘀汤等。

王清任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医药学,特别是对血瘀论及活血化瘀治法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均有巨大贡献,被誉为活血化瘀名家。

(接三版)其都城布局结构和设计理念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更多地进行了创新和超越,体现了法家思想和“法天”思想,形成了以“新”“尊”“博”为特征的“大一统”大国都城的新气象。因此,咸阳的设计和建设正体现了以超越商周王城和列国国都,适应王权至高无上为规划设计追求,“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王权尊严,并以宏大广阔、气势恢宏凸显其博大胸怀和气质。商鞅变法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也推动秦文化华丽转型。转型后的秦文化在保持原有特质的基础上,具有了崇法重刑、耕战为本、军功授爵和实用功利的新特点,并激励秦国出现以令行禁止的法治精神、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家国一体的天下胸怀和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为表征的社会新风尚。借此文化优势,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七代秦人致力秦国强大,完成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列国争霸、战乱纷争的动荡局面,“阡并天下,留害绝息,水偃戎兵”。

不难看出,一部秦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秦人上承三代文化之精粹,兼容西戎文化之养料,博采列国文化之长,统摄融汇农耕、游牧两大文明于一体,多元融通和创新升华的文明结晶。这种文明演进的背后,既有服务于天下一统的先进理念的支撑,更有服务一统的国家制度的支撑,并最终在秦王朝的建立为标志,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文化的整合,“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主要通过强硬的手段推行有关政策和理念,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统一。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为“大一统”打上了鲜明的标志,中华文化的的主流文化一体延续,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既多元绽放,又持续汇入主流,形成了基于统一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秦文化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

五、传承创新:秦文化的历史启示与时代意义

秦人、秦国、秦王朝虽然都成为过往,但秦人及秦文化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新阶段,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和精神财富。古往今来,人们不禁会问后来居上的秦人何以能够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终结动荡纷争的旧时代,开创“大一统”的新时代。一般而言,追求统一的政治抱负,积极进取的先进文化,顽强拼搏的民族性格,始终重视军事实力,比较彻底的变法改革等,无疑是助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但从更深层而论,还有以下四点非常重要。

(一)心怀天下的价值观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失核心价值观,秦人从大国附庸到历史边缘,由历史边缘到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主角,进而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世界,其始终不坠的是顺应历史趋势和时代呼唤,心怀天下,对以“大一统”为标志的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从秦人建国之际秦襄公僭越礼制,以天子之礼设时祭天,到秦穆公以“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居,从秦武王举鼎绝脰到秦王嬴政伏六王而定天下,能看到其问鼎中原、一统天下之志由来已久、一脉相承,而且付诸实践,咬住青山不放松,聚沙成塔、久久为功,终获成功。

(二)与时俱进的文化观

秦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秀的特质,其特色和优秀来

自秦人宏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在秦文化中,对周文化的继承无疑是其主体成分,但在秦国社会,并未因此而受周礼束缚趋于保守。如血缘宗族和世袭贵族对秦国政治的影响远较东方六国为弱,故以地缘为主的郡县制在秦国、秦王朝得以推行。再如后起的秦人虽然在文化上并没有产生像东方六国那样的大思想家和重要的学术流派,但却在重用六国人才并将新的思想文化创造性运用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方面,不仅遥遥领先,而且非常成功。究其根本,就在于秦国形成了因地制宜、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文化观,由此确立了其文化始终能够趋向先进的优势地位。

(三)富国强兵的发展观

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兴盛,既需要正确的道路方向选择和先进的治国理念引领,也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二者缺一不可。秦国在致力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始终重视经济发展和技术应用,兴修水利,推广铁器、牛耕,以农为本,奖励耕战,是秦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有力支撑。特别是到战国后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三大经济区秦国独占其二,而且还拥有陇右等西北战马基地,其国力已远超东方六国,《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富十倍天下”。可见,国力雄厚、兵强马壮是秦国实现和巩固“大一统”的根本物质基础。

(四)奋发有为的事业观

坚忍不拔、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是秦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也是秦人上下一心、埋头苦干、讲求实效,开创强国事业和实现“大一统”目标的精神力量。秦文化中敢为人先、坚忍不拔、奋发图强、求实进取、刚健尚武、令行禁止、追求进步、开放兼容等精神品格,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支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

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间,曾出现过不少地域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但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在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后,无不消亡解体。唯有“大一统”秦王朝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所奠基的古老中国,虽历经分裂与动荡,饱受侵略与宰割,却仍然一次次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与天地同在,同日月永光,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历史上先进的“大一统”思想和秦文化所奠定的“大一统”文化的意义及价值正在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产生了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我们要对秦文化中先进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养分和智慧力量,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有利于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